

从革命思维 到执政思维

——党的历史方位的改变与理论思维的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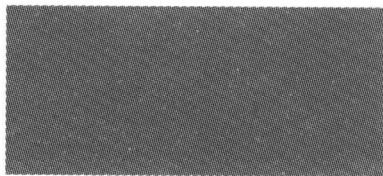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李永清等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从革命思维到执政思维

——党的历史方位的改变与理论思维的更新

李永清 等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革命思维到执政思维——党的历史方位的改变与理论思维的更新/李永清等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7.2

ISBN 978-7-5035-3634-2

I. 从… II. 李… III. 中国共产党—党建—研究 IV.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06952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电话(010)62805800(办公室) (010)62805818(发行部)

邮编:100091 网址: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燕华印装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07年2月第1版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6.5

字数:270千字 印数:1—3000册

定价:27.00元

责任编辑 王 琪
封面设计 新动力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马 晶
责任印制 宋二顺

概 论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明确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以来的 80 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历史方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9 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人民以夺取全国政权为目标的革命党。1949 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执政党。1978 年以后，又进一步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成为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历史方位的改变，必然要求理论思维的更新。

历史是发展的，时代是进步的，任何一个政党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其自身状况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并且在这二者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下，其历史方位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对于一个政党来说，能否科学地判断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并实现理论思维的更新，直接决定着这个政党能否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影响到这个政党的前途和命运。

一、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改变

“历史方位”是近几年中国共产党在给自己定位时首次使

用的概念。“方位”不同于“地位”，它不是在一条直线上界定某一事物的位置，也不是在一个平面上界定某一事物的位置，而是在一个三维时空中界定某一事物的位置。

确定一个事物的“历史方位”，既需要对照一个事物的昨天和明天来判断它的今天，也需要考察它所处的周边环境的变化、联系它与周围事物的关系来确定它的位置，还要考虑到事物的自身是在不断变换和运动的，它同时也影响着周围事物和环境。因此说，一个事物的“历史方位”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它的位置的确定在一定时期只是相对的。只有这样思考和确定一个事物的位置、判定它的性质和作用，才符合唯物辩证法，才是科学的、准确的。

考察和界定中国共产党今天的历史方位，至少要考虑这样三方面因素：与过去相比，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它所担负的任务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它的前进方向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今天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状况如何，它发生了哪些变化。也就是说，党的历史方位既包括对党的历史、现状、未来的地位、任务、方向的纵向认识，也包括对党当前所处国际、国内环境的横向比较，还包括对党自身状况的分析和考察。

（一）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改变的纵向分析

首先，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变为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党作为中下层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其第一要务就是组织和领导党员及社会上绝大多数民众开展武装斗争，反对现存的国家统治。所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处在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非执政地位，处于被屠杀、被围剿、被压迫的地位。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旧的反动政权被推翻，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转变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成为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党，成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组织者、推动者和领导核心。

党的地位的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统治与被统治、执政与非执政这些方面，还体现在党同人民群众、党同国家政权的关系及定位上。

党的执政地位的获得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有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但同时也面临着如何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执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和执政之基，能否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的兴衰成败。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党处在极其艰苦和激烈的武装斗争环境中，共产党人只有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密切联系群众，才能有立足之地，否则，就有灭亡的危险。执政以后，党居于国家的领导地位，手中掌握着丰厚的、与执政之前所无法比拟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和巨大的权力，这就为一些党员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取个人的特殊利益提供了机会和可能。特别是长期执政，使一些党员干部不同程度地产生某种优越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渐渐滋长，极个别者逐渐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凌驾于群众之上的主人，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作为执政党，只有认识到自己地位的变化，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赢得他们的拥护，从而为长期执政奠定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执政地位的获得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夺权时期，党同国家政权的关系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党所奋斗的目标之一就是砸烂旧的国家政权。执政以后，党成为国家权力的执掌者，它不再在国家政权统治之下，而成为国家政权的领导者。这种变化，改变了执政以前党的活动处处受制于国家权力，甚至遭国家权力的镇压的局面，但是，如何认识国家政权的本质和职能，如何摆正执政党的位置，如何正确处理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等，又成为一系列必须处理好的问题。

其次，党的中心任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领导武装斗争、夺取国家政权转变为领导国家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政权是政党政治的中心问题，任何政党成立后，无不把夺取政权作为本党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在革命夺权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始终代表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他们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夺取国家政权。在成为执政党之前，我党所做的一切理论和实际工作都是围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这一中心任务而展开的。政党夺取政权不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革命以暴力的手段取得；一种是通

过议会民主以和平方式取得。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主义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产阶级政党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进行罢工的合法权利，没有以和平方式谋求社会改革的可能，只有走暴力革命的道路。面对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这一首要任务，我们的理论必须为实现这一目的服务，一切路线、方针、政策、做法都必须与此相一致。

取得政权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以夺取政权、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为主转向执掌政权、领导国家建设。然而在夺取政权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我们对党的地位和作用发生的变化认识不足，加上没有实践经验，偏离了经济建设和生产力发展这一执政党的中心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从根本上扭转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党的地位、党的中心任务和党的历史方位是密切相关的。地位决定一定时期内党所处的位置，中心任务决定党一定时期内的努力方向。在纵向坐标中，找准历史的时空位置，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才能明确这一时期党的历史方位。

（二）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改变的横向分析

首先，党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国际环境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国际环境。

我党诞生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为满足掠夺与发展的需要，对内加紧剥削和镇压本国人民，对外疯狂侵略和扩张，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化，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连绵不断，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题，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日益成熟。列宁创立的帝国主义理论，特别是他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帝国主义统治薄弱环节的一国、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思想，阐明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和发展规律，为落后国家的革命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开创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不仅为这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示范和楷模，而且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落后国家的政党

提供了谋求解放和发展的有利的国际环境，并将这些国家的革命最终卷入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潮流中，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二战以后，随着第三世界的迅速崛起和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世界大战的危险逐渐减少，和平与发展逐步代替战争与革命而成为时代的主题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一是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各种力量互相制约和依存，使我们完全有可能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加快发展。二是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加速推进，加速了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发展的活力，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三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我们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才能追赶世界科技进步的潮流，适应知识经济兴起的挑战。四是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只有积极参与其中，才能使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体现在综合国力的强大竞争力上。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西方国家妄图用他们的一套政治观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西化”、“分化”我们的图谋始终未变，给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总之，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使得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互交织，相互转化，形成了一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我们只有对这些变化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准确把握我党所处的历史方位。

其次，党所处的国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革命夺权时期的斗争环境转向执掌政权、领导建设的和平环境。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相互勾结，使得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及其尖锐化，严重地阻碍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从此，对外反抗侵略、捍卫民族独立，对内反对专制、争取社会进步的反抗斗争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但无论是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还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表明，中国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无法再向前发展，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寻找新的思想武器，由一个新型的政党来承担。中国共产党

正是适应这一时代的需求而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同时，这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革命夺权时期，始终处于极其严峻的斗争环境中。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其间，尽管有“左”的思想路线的干扰，但国内大环境与夺权革命时期还是有了根本性变化。由于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多方面的原因，我们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在封闭半封闭的环境下搞社会主义建设，它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经历了短暂的高速发展后，便陷入低速度的徘徊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又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逐步转变为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使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随着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利益关系多样化的发展，各种深层次的矛盾日渐显露，党的执政环境又有了新的变化，这向党的执政理念和工作思路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和挑战。

（三）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改变的自身分析

首先，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夺权时期，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主要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被统治、被压迫的社会阶级和阶层。执政后，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现代化建设，这一点决定了党不仅要有自己的阶级队伍和骨干队伍，而且要尽可能地把所有的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所以，凡是拥护社会主义、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都属于党的执政基础之列。特别是随着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的变化，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更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从党的阶级基础来看，一方面，工人阶级的队伍在不断壮大，其思想解放程度，公平、竞争、效率、民主、革新等意识不断增强，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特别是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进一步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科技文化素质，使工人阶级队伍中科技人员的数量急剧增加，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最积极力量。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分工的急剧变动，使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和重组加快，出现了普通工人群众、知识分子群众、机关公务员群众、企业经营管理者群众和包括下岗工人在内的

不同的利益群体。特别是大批工人纷纷下岗，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处于就业无保障的状态，成为工人阶级内部新的弱势群体。下岗工人新群体的出现，影响了工人阶级的整体团结和工人阶级阶级意识、阶级认同感的提升，给工人阶级自身队伍的建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从党的群众基础来看，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作为党的群众基础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阶级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所造成的工农之间严格的身份壁垒，农民与市场有机结合，一部分农民走出土地，从事不同的行业，分化到不同的阶层中，这种分化带来利益需求的多元化，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新挑战。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强力推动下，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新阶层，是把他们吸引和凝聚在党的周围，还是把他们推到党的对立面？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是应该吸收到党内来，还是拒之于党的门槛之外？如果把社会各方面的优秀分子都吸收到党内，必然会出现党员成分的多元化，这样会不会削弱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党所面临的重大而且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

其次，党自身的队伍状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已经由成立时仅有几十名党员的小党，发展到今天拥有70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党的队伍空前壮大，新党员数量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特别是一大批年轻党员干部走上领导岗位，给党的肌体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党自身队伍状况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党的建设所带来的挑战。一是党员队伍的壮大使得对党员的组织和管理任务比过去艰巨繁重得多；二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使新党员的来源日趋多元化，党员的社会成分、社会职业趋于多样化，对如何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提出了挑战；三是党的基层队伍建设面临挑战；四是从主流上看，党员干部队伍是好的，但与战争年代忘我奋斗的革命精神相比，也确实有一部分党员理想信念淡薄，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以权谋私、贪污腐化，严重破坏了党的形象。

总之，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同建国以前的共产党相比、同改革开放以

前的共产党相比，无论从国内环境到国际环境、从社会地位到历史任务、从阶级基础到群众基础、从党员数量到党员构成等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改变。

二、中国共产党理论思维的更新是历史方位改变的必然要求

历史方位改变了的中国共产党，许多重大现实问题需要用创新理论予以分析，许多深层次的思想认识问题需要用创新理论予以明辨，许多思想困惑需要用创新理论予以阐释。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无论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我们都会发现，中国共产党理论思维的更新是历史方位改变的必然要求。

(一) 中国共产党思维更新必然性的理论探源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夺权的指导思想是非常完备和精辟的，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必然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论述了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群众推翻资产阶级及一切压迫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它的确是无产阶级革命与夺权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但是，对于夺取政权以后共产党如何领导建设，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涉及这一问题。因为他们认为，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消灭私有制的过渡时期的结束，资产阶级被消灭了，与之相对的无产阶级也会消亡，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政党和国家也会消亡。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未来社会中，不存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国家建设的问题。对此，《共产党宣言》讲得非常明白：“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列宁大量的著述是针对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而言的，它的“一国胜利学说”成功地指导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如何领导国家建设这一问题，列宁做了某些探索，但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备的理论体系。

斯大林、毛泽东在领导苏联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于执政党如何领导国家建设，都有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回答，但总体上来讲，他们都未能科学地回答这一问题。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马列主义理论的侧重点来看，它是一个指导无产阶级及其劳动群众夺取政权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根本作用和目的在于论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对此，恩格斯讲得很清楚，他在1847年《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就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① 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如何领导国家建设这一问题上，我们不可能从马列主义之中找到现成的答案。并且，传统的“革命”、“夺权”思维如果不发生根本性转变，它将影响甚至阻碍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成功地领导执政与建设。因此，历史方位变化了的中国共产党，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执政党、要成功地领导国家建设，必须扬弃传统的“革命”、“夺权”思维，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有利于执政和建设的理论体系。

（二）中国共产党思维更新必然性的实践探源

从领导夺权的革命党向领导建设的执政党这一历史方位的转变，本来在1949年，至多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就应该完成，但是，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的思想的影响，党的中心工作并没有转到领导建设上来，执政党还在领导“革命”，包括以重新夺权为目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78年以后，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又经过20多年的体制变革，对外由封锁封闭到开放融入，对内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才找准了在和平发展的时代，作为执政党如何领导国家建设的历史方位，并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并明确表述了这一问题。但是，这一转变还没有彻底完成。

回顾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转变从应然到实然，从认识的不清醒到清醒，从开始转变到彻底完成转变，大体经过政权转移、角色改变、体制变革、理论更新这样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只有这四个阶段、四个方面的任务全都完成，才能够说中国共产党彻底完成了从领导夺权的革命党向领导建设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执政党的转变。

第一阶段：政权转移阶段。

政权转移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政权转移的标志是最明显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不久，就开始了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政权转移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夺权任务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这一阶段的结束。在这一阶段，党所形成的所有的组织、体制、观念、理论等都是为革命所创立的、为夺取政权服务的。政权的取得，并不能使中国共产党即刻就能在组织、体制、观念、理论等方面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它只是这一转变的开始。

第二阶段：角色改变阶段。

这一阶段，花费了我们党大约30年的时间，也使我们的党和人民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取得政权以后，特别在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党应当自觉地实现角色改变，即由领导夺权的革命党变为领导建设的执政党。对此，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我们党曾有过短暂的、比较清醒的认识。但是，正确的认识很快被革命思维的惯性、阶级斗争的传统意识所淹没。一个已经取得政权的政党，仍然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任务，以继续革命为追求，角色并没有转换过来。继续革命的对象，最终落到自己的同志身上——“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一代伟人毛泽东直到生命的终结，也没有完成从革命思维向执政思维的彻底转变。

第三阶段：体制变革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观念转变阶段的结束。我们终于认识到，作为执政的政党，主要任务是领导国家的经济建设，而不是搞阶级斗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但是，在战争年代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形成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以及对外的方针政策，从根本上来讲是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等阶级斗争目的服务的。这些组织和体制，不适合一个执政党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背景中、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领导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所以说，从1978年开始，我们进入了从领导夺权的革命党向领导建设的执政党的体制变革阶段。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党改革了党领导国家的方式，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制定了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特别是社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初步建立，使这一转变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应当承认，这一转变还没有完成，其任务还相当艰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的“革命”思维、“夺权”思维还影响和禁锢着人们的行为，阻碍着体制的变革。

第四阶段：理论更新阶段。

理论更新阶段的起点和体制变革阶段是同步的，都开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是，理论的更新比体制变革更艰难，因为许多为夺权和阶级斗争服务的传统理论观点，经过多年的宣传和灌输，已深深植根于几代人的脑海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了使体制变革不受干扰，对于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采取了“不争论”的做法，只做了不说、做了再说成了不少地方改革成功的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理论为理论更新奠定了基础，它提出并初步回答了许多服务于执政和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这一问题，也比较系统的解答了一些深层次的理论更新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我党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也必然会成为我党彻底实现理论更新、构建与新的历史方位相符合的执政思维和建设思维的指导思想。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相对于从领导夺权的革命党向领导建设的执政党的体制变革，理论更新的任务更艰巨，需要走的路更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时至今日，在我党历史方位转变的全过程中，我们只是走完了政权转移、角色改变两个阶段，体制变革、理论更新还是进行时。从一定意义上讲，理论更新是无形的、深层次的、决定性的，它支配着角色改变和体制变革。如果不彻底扬弃那些长期形成并深深植根于人们头脑中的有利于夺权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不系统创立适合新的历史方位的、有利于执政和建设的理论体系，我党的角色转换不会到位，体制变革不会成功，也将最终难以承担执政和领导国家建设的历史重任，手中的政权也会得而复失，出现新的转移。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我国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应当看到，这种转变主要是体现在政策层面上。在理论层面上，虽有一些变化，但转变并没有彻底完成。理论层面由“夺权·革命”思维向“执政·建设”思维转变的滞后，已日益明显地表现出与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不适应。彻底

完成我党、我国意识形态在理论层面上从“夺权·革命”思维向“执政·建设”思维的转变，已成为我党现阶段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根本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

三、中国共产党理论思维更新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实现理论思维的更新，并不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正确的、符合时代要求的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行之有效的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所谓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彻底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扬弃传统的、为“革命”、“夺权”服务的某些陈旧观点，创新符合时代要求的、为“执政”、“建设”服务的新思想、新观点。

中国共产党理论思维的更新，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的建设等方面。本课题主要对以下几方面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与探讨。

（一）从传统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转向“和平与发展”的新的时代观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中，夺权离不开革命，革命离不开战争。要实现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历史任务，暴力革命是其一般规律和基本道路。应当承认，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战争与革命的确是时代的主题。俄国、中国以及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权无一不是通过战争与暴力革命而取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了中国、东欧等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二战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还期盼着通过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人类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时代的主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从“战争与革命”逐步地转入了“和平与发展”。这种转变，有核武器对战争的遏制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讲，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结果。社会的进步，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大的方面逐步地削弱和消除了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因利益的不可调和而造成的战争根源。

从古至今，战争的缘起无非三种因素：一是经济利益；二是政治权

力；三是文化差异。这三种因素，在 20 世纪中叶以后都逐步得以化解。

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通过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市场化得以化解。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战争双方争夺的是人口、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及物质产品。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财产的大规模转移和重新分配只能凭借战争与掠夺，因此，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战争争夺的是殖民地、是市场，这与整个世界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有着直接的关系。从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贸易壁垒的日益打破，世界经济朝着一体化发展的进程越来越快，特别是苏东剧变以后，原本对立的两个经济体系趋向一致。我国加入 WTO，更大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全球化。可以这样讲，今天的世界，经济利益的分配已经由过去几千年来靠战争争夺的方式转变为靠市场竞争的方式。科技发达、管理先进、资金雄厚的一方无须通过战争，完全可以以文明、合法的方式取得更多的财富。因此说，由争夺经济利益而缘起的战争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得以消除。

政治权力方面的冲突通过世界范围的民主化得以化解。在一个国家内，只要真正实现了票决的民主制度，政权的更替完全无须再用枪杆子来决定。在现代民主制度建立之前，任何政治势力和领袖人物都宣称自己是人民和国家利益的真正代表者，是政权的当然所有者。但是，到底谁真正是大多数人民的拥护者，必须靠战争来裁决，真正的得民心者一般来讲会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现代民主制度建立以后，和平的选举代替了血腥的战争，得票多者自然成为执政者。并且，这种票决每几年进行一次，基本消除了国内战争的政治根源。因此说，随着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推进，由争夺政治权力而缘起的战争因素也趋向弱化。

文化差异方面的冲突通过文化的广泛传播与交流可以得以化解。文化差异可以引起战争，但文化差异的形成关键是封闭、愚昧、统治者对人民的愚弄所致。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对于真善美的评判，只要有良好的教育、自由的新闻制度、充分的沟通和交流，人们自然会趋向一致，并逐步地消除偏见和隔阂。同时，文化的广泛传播和交流也是以相互承认和包容为前提的，只要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国家也不会发生战争。20 世纪中叶以后，科技的发展使得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电子媒介普及全世界，任何对思想、知识、信息的封锁都将成